

东南亚华人华语价值优势实证研究

姚敏 韦九报

摘要: 以“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三国懂华语的华人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实证检验东南亚华人华语的价值优势及其形成机制。研究显示,华语在语言能力、多行业使用频率、交际价值指数及经济价值指数中均领先于英语、当地语言及汉语方言,成为东南亚华人社会交往与经济活动的核心语言。华语的价值优势既源于深厚的华人社群基础,也与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拓展、跨境经济合作深化直接相关,具体表现为就业机会增加、就业周期缩短、收入溢价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华语的经济价值具有鲜明的“圈层溢价”特征,即必须置于“涉华商贸网络”这一前提下进行理解。与英语的“入场券”特征相比,华语更像是“加速器”,其经济价值仍有巨大提升空间。研究结论为“一带一路”背景下语言政策优化、国际中文教育推广及华人多语能力培养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跨境经济合作中的语言资源开发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东南亚华人;华语;价值优势;实证研究;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 H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6)03-0138-15

一、引言

移民移居他国,不仅需要掌握居住国的国家通用语、民族语甚至方言,如果是非英语国家可能还要掌握国际通行语—英语。据统计,海外华侨华人数量已经达到6000万,其中,东南亚华人约占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8%。^①东南亚华人移民历史悠久,传统保持良好。老一辈东南亚华人注重乡土观念,重视华文教育,而且华人社团也比较发达,华人之间仍可用华语甚至汉语方言交流。一般认为,英语仍是“第一”重要的经济语言,但是华语及汉语方言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正得到了越来越多东南亚华人的认可,二者的实际作用价值是否已经比较接近,以及华语、汉语方言、英语、所在国主流社会语言的价值顺序如何,是本文所着重想探究的。

作者简介:姚敏,北京华文学院副教授,(国家语委)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韦九报,北京华文学院副教授,(国家语委)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9年重大项目“境外华语资源数据库建设及应用研究”(19ZDA311)的阶段性成果。

^① 吴前进:《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的华人:旧问题 新忧虑》,《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6期。

二、文献综述

(一) 国内研究: 突出语言的经济价值

学界认识到语言是一种可贵的资源已有近五十年的时间,从应用语言学角度提出语言资源开发^①,到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推动语言资源观的普及^②,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重视语言的经济价值。人们发现,语言也是“嫌贫爱富”的,语言地位取决于背后的经济实力^③。语言不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一种具有价值、成本、收益和效用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④ 海外华语是全球华人共享的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从语言市场的角度来看,它也是当今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⑤ 国内外的研究也表明,语言能力的高低常常决定着就业的机会和收入的水平。^⑥

在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中,对语言经济价值的认识逐层深入。李宇明教授认为,语言教育有事业和产业之分,语言教育事业需要成本投入,涉及经济问题;语言教育产业则主要是经济活动^⑦。惠天罡先后对国际中文教育产业化的经济和文化属性、产业价值、现实基础和发展趋势进行了论述^⑧,并进一步对国际中文教育供给侧优化的理论依据与发展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⑨。郑东晓等围绕经济价值回顾了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四个阶段,并阐释了国际中文教育双重价值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坚持公益为本,激活经济效能”的价值观念^⑩。曾晨刚等指出中文在泰国的求职价值受个体的中文水平、语言分项技能、求职行业的影响;个体中文水平与求职机会呈正相关关系;国际贸易以及旅游行业为泰国中文人才提供的就业机会多于教育行业与制造业。族裔身份会影响中文经济价值,掌握中文的华裔能够获得更多的求职机会与更高的劳动报酬,且不受行业分工影响^⑪。

新时代,语言作为数据成为语言要素参与社会生产的一种新形式,更是展现出了显著的经济属性。^⑫ 李宇明教授曾指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架起了三座“立交桥”:推广普通话建立起了全国立交桥,东南方言连接起了港澳台和东南亚的立交桥,外语学习建立起了海内外的立交桥。^⑬ 在这三座语言“立交桥”中,东南亚华人运用自己的语言能力连接起了后两座“立交桥”,其所发挥的作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 国际前沿: 语言溢价的最新成果

在劳动经济学中,“语言溢价”(Language Wage Premium)通常指:在控制教育、经验、地区、行业、职业等因素后,语言能力(或多语能力)对工作或收入的边际贡献。近几年,国际学界相关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显著转向:不再满足于基于自评数据的简单回归,而是利用行政大数据、准实验(RDD)及随机对照试验(RCT),深入探讨语言能力的客观测量、因果回报及其异质性。

加拿大统计局 Xu 和 Hou 利用技术移民的官方语言考试成绩(CLB/NCLC)研究发现,传统的自评语言指标对收入的解释力较弱,而分项测试成绩能精准识别收入差异。例如,阅读能力达到高级(CLB ≥ 10)的移民比中级(CLB 7)的年收入高出约 25%。这表明,以往基于问卷自评的研究可能因测量误差

① 邱质朴:《试论语言资源的开发—兼论汉语面向世界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3期。

② 郭熙、刘慧、李计伟:《论海外华语资源的抢救性整理和保护》,《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陈章太:《论语言资源》,《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1期。

③ 郭熙:《多元语言文化背景下母语维持的若干问题:新加坡个案》,《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4期。

④ 赵世举:《“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及服务对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⑤ 郭熙、雷朔:《论海外华语的文化遗产价值和研究行业拓展》,《语言文字应用》2022年第2期。

⑥ 李宇明:《一带一路语言铺路》,《光明日报》2018年08月12日12版。

⑦ 李宇明:《认识语言的经济属性》,《语言文字应用》2012年第3期。

⑧ 惠天罡:《汉语国际教育产业化引发的若干思考》,《语言产业研究》2019年。

⑨ 惠天罡:《国际中文教育供给侧优化的理论依据与发展路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⑩ 郑东晓、杜敏:《新阶段国际中文教育的经济价值及其产业发展》,《江汉学术》2022年第6期。

⑪ 曾晨刚、王祖嫒:《海外中文经济价值的影响因素及实现策略研究—来自泰国的证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⑫ 王海兰:《试论语言数据的经济属性》,《语言战略研究》2022年第7期;黄少安、汪张龙、宋晖等:《“语言数据与数字经济”多人谈》,《语言战略研究》2022年第7期。

⑬ 李宇明:《推广普通话与扶贫事业》,中国语言扶贫与人类减贫事业论坛上的发言,2019年10月15日。

掩盖了“真实语言资本”的边际回报。^①关于语言培训回报的“因果推断”揭示了“质量”与“证书”的关键作用。并非所有语言投入都能转化为经济产出。Arendt 等对丹麦难民长达 18 年的跟踪研究显示,高质量、长周期的语言培训改革能显著提升长期就业率和收入。^②然而,Marbach 等针对德国难民危机期间推出的短期、缺乏标准化认证的“临时语言项目”进行评估,发现其对就业几乎无显著影响。^③这提示我们,语言溢价的实现高度依赖于培训系统的标准化程度及劳动力市场的信号认可机制。

国外学界也开始关注语言溢价的“异质性”与“信号机制”,证明语言红利并非对所有群体自动生效。Gabrielle Hogan-Brun 在其著作《语言经济学》一书中阐明了多语能力与市场潜力之间的关系,发现掌握了不同语种者的收入并不太相同。^④Churkina 等进一步指出,由于职业选择(Sorting)机制的存在,早期双语者若未进入特定细分市场,未必能获得稳定的工资溢价,甚至在部分低收入端存在“双语惩罚”。^⑤在雇主需求侧,Carlsson 等的简历实验证明,语言熟练度主要通过提升面试回访率来发挥信号作用。^⑥Ek 等进一步补充指出,这种信号效应在低技能岗位中并不敏感。^⑦此外,Azad 和 Fahmida 针对海湾国家劳工的研究^⑧以及 Zhou 等对香港的研究^⑨均证实,语言回报率会随地缘政治和教育程度的互补性发生动态调整。

综上,国内研究为我们理解东南亚华语的政策背景提供了广阔视野,国际研究则解释了语言回报的“微观因果”与“客观测度”。不过,现有的国际前沿成果多集中于欧美移民或难民群体,鲜有对东南亚华人这一特定人群的研究,也缺乏针对“华语与英语”在东南亚特定经贸生态中实际回报率的对比实证。本研究尝试将国际前沿的微观分析逻辑(如关注职业分层、客观能力与收入的匹配)引入东南亚华语研究,在控制行业选择与教育互补性的基础上,更准确地测度多语能力的真实经济价值。

三、问卷设计与分析

(一) 调查对象

问卷调查的对象聚焦于“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主要贸易国——泰国、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和马来西亚——中懂华语的华人。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国家,是因为全球约半数的华侨华人居住在这三个东南亚国家^⑩,他们的样本具有较高代表性。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92 份,有效率为 97.3%。在受访者中,30 岁以下的青年居多,占 44.86%;30-40 岁年龄段的调查者次之,占比为 34.25%。选择这两个年龄段作为主要调查对象的原因在于,青壮年群体无论对家庭还是对国家经

① Xu L. and Hou F., “Official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Immigrant Labour Market Outcomes: Evidence from Test-based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s of Language Skills,” *Statistics Canada Economic and Social Reports*, vol. 3, no. 4, 2023, pp. 1-13.

② Foged Mette, et al., “Language Training and Refugees’ Integra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106, no. 4, 2024, pp. 1157-1166.

③ Marbach M., et al., “Does Ad Hoc Language Training Improve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Refugees? Evidence from Germany’s Response to the Syrian Refugee Crisis,”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Statistics in Society*, vol. 188, no. 4, 2025, pp. 1168-1183.

④ Gabrielle Hogan-Brun, *Linguanomics: What is the Market Potential of Multilingualism?*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2017, p. 112.

⑤ Churkina Olga, Nazareno Luisa and Zullo Matteo, “The Labor Market Outcomes of Bilingu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ccumulation and Returns Effects,” *Plos One*, vol. 18, no. 6, 2023, pp. e0287711-e0287711.

⑥ Carlsson M., Eriksson S. and Rooth D O.,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Hiring of Immigrants: Evidence from a New Field Experimental Approach,” <https://docs.iza.org/dp15950.pdf>, Feb., 2023.

⑦ Simon Ek, Mats Hammarstedt and Per Skedinger, “Low - skilled Jobs,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Job Opportunities for Refuge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6, no. 2, 2024, pp. 355-386.

⑧ P. Azad and M. V. Fahmida, “Impact of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on the Wage Returns of Kerala Migrant Workers in Gulf Countries,” *The Indian 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 vol. 67, no. 3, 2024, pp. 1-15.

⑨ Yonghong Zhou, Rong Zhu and Xian Zheng, “Second Language Skill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Evidence from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59, Issue C, 2020, pp. 101366-101366.

⑩ 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代移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前言第 2 页。

济都是中流砥柱,因此在调查问卷发放时有意识地覆盖这两个年龄段的人群。然而,为了对不同年龄华人群体的多语状况有一个全面了解,我们还是选取了不同年龄段的调查对象,包括 10% 的 40-50 岁人群,6.16% 的 50-60 岁人群,以及 3.7% 的 60 岁以上人群。

从调查对象的职业分布来看,教育行业的调查对象最多。其次是公司职员、自由职业者、经商人士、自主创业者、无工作人群、工业和农业。从工作年限看,工作 1-3 年的占比 31.5%,工作 4-5 年的占比 13.4%,工作 6-10 年的占比 27.4%,工作 11-15 年的占比 11%,工作 16 年以上的占比 16.8%。调查者中有 65.75% 的受访者的工作与中国有关,或在业务上有联系。

除调查问卷外,为验证本文的结论,还在上述三国分别对男女各 2 位访谈对象进行了深度访谈。这 6 位访谈对象均为笔者多年前的学生,中文流利,且愿意与笔者进行比较深入的交流和真实想法的分享。他们的年龄在 30-40 岁之间,工作年限均已超过 10 年,正是年富力强,熟悉当地就业市场的年纪,且在各自的国家都小有成就。从语言状况看,他们都是多语言能力者,最少都会当地语言、英语和中文三种,还有的不仅会多种汉语方言,甚至还掌握了当地国少数民族语言,如“马答语”“淡米尔语”等。访谈对象包括:郭先生,来自印尼,现为中国及欧美著名汽车品牌在印尼的总代理;郭女士,来自印尼,是郭先生的堂妹,当年兄妹俩一起来北京学习汉语,目前在一家中资企业担任 HR;李先生,来自马来西亚,现任大学商学院的助理教授,专门研究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企业在马来西亚的发展;林女士,来自马来西亚,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做进出口贸易工作;郑先生,来自泰国,目前经营家族企业——家具生产厂;刘女士,来自泰国,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我们对以上三国的情况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对本文的调查起到了有效的补充作用。

(二) 调查内容和方法

课题组调查了华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泰语、马来语、汉语粤方言、福建话^①、客家话、海南话、福州话、闽北话、潮州话及其他(可自填)等 13 种语言的使用情况。

调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背景调查,调查答卷人的性别、年龄、工作或行业、工作年限、工作是否与中国相关、月收入、收入水平自判,共 7 项。第二部分为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等客观情况的调查,共分为五个维度,共 65 项。第三部分,了解调查对象关于多语的主观看法,共三个维度,共 106 项。总共 178 项。详情如下。

表 1 调查问卷内容

序号	维度	题型	项	内容备注
第一部分 个体背景调查				
1	背景调查	选择	7	性别、年龄、工作或行业、工作年限、工作是否与中国相关、月收入、收入水平自判
第二部分 客观情况调查				
2	语言能力调查	量表题	13	
3	在工作中使用的频率	量表题	13	
4	在家庭生活中使用的频率	量表题	13	
5	在个人社交中使用的频率	量表题	13	
6	在网络生活中使用的频率	量表题	13	
第二部分 主观认识调查				
7	认为掌握该语后收入会增加	量表题	14	多语+13 种语言
8	认为掌握该语后有助于就业工作	量表题	14	多语+13 种语言
9	认为该语在行业中有用性	量表题	78	6 个行业(农业、工业、商业、建筑、教育、法律)×13 种语言
总计			178	项

^① 很多新马华人用“福建话”指代“闽南话”,考虑到大多数调查对象的情况,本调查也使用“福建话”指代“闽南话”。另,潮州话和海南话也属于闽南话分支,本调查还是按照东南亚华人的习惯将这两种语言单列。

1.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使用 SPSS 22.0 对所得数据进行可靠性计算。第一部分是背景调查,第二部分是客观情况调查,无需进行可靠性分析。第三部分为主观心理测试,可靠性检测显示,该部分题目的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为 0.948,结果一致性较高,超过了 0.65 的参考值。删除后的 Cronbach α 值均低于整体 α 值,表明通过信度检验。详细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问卷主观测试部分可靠性检验结果

维度	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	总系数
认为掌握该语后收入会增加	0.922	0.948
认为掌握该语后有助于就业工作	0.901	
认为该语在行业中有用性	0.955	

2. 效度分析

效度检验使用最大方差法对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方法为特征值大于 1。结果显示 KMO 值为 0.864,超过 0.7 的参考值,达到了较好的水平,Bartlett's 球形检验显著度 ≤ 0.001 。通过检测。详情如表 3 所示。

表 3 问卷效度检验情况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864
Bartlett's 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	49782.793
	自由度	7381
	显著性	≤ 0.001

综上所述,前期设计的调查问卷质量良好,可以进行下一步统计分析。

对调查数据进行进一步统计分析的方法有三种。一是标准差分析,用以分析某一组数据平均数所不能反映的离散程度,如认为掌握某种语言后收入会增加的数据标准差,能体现被调查者对该问题认同的趋同程度,也即是基本都这样认为,还是高的高、低的低。二是皮尔逊相关分析。用以分析某一因素,如多语能力,与某一因变量,如月收入之间关系的显著程度。三是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用以分析两类自变量,如男女性别在某一因变量,如多语能力上的差别。四是单因素方差分析,用以确定某一多类因素,如工作年限对某一因变量,如多语能力的影响是否显著。

(三) 调查结果

1. 华语能力优势

语言能力分别从语种、语言使用域和国别几个视角进行考察。从调查对象掌握的语种来看,东南亚华裔总体而言掌握最好的语言是华语和英语^①,第三是当地主流社会的语言,分别为马来语、印尼语、泰语。最后是汉语方言,其语言能力从高到低依次是粤语、福建话、客家话、潮州话、福州话、海南话和闽北话。其他语言还包括淡米尔语、缅甸语、兴化话等。这说明,这些国家地区的华裔多语能力范围要比我们调查的范围更广。

^① 这里显示的是总体情况。根据我们的后续访谈发现,每个国家由于历史不同,具体情况是有差别的。比如,马来西亚由于华文教育一直在华人中普及,所以马来西亚华人的华语能力整体高于其他国家。而在印尼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华人的第一要务是学习好当地语言,特别是国语。因此,40 岁以上年纪比较大的华人群体仍然认为印尼语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认为华语重要的多是 35 岁之前的年轻华人,他们受到历史的影响比较少,在现实中感受到了华语带给他们的红利。泰国的情况与印尼相似,华文教育也曾一度中断。但由于历史上泰国政府的政策相对柔和,泰国华人对不同语言的态度也是潜移默化逐步形成的。中泰两国贸易恢复较早,上世纪 90 年代泰国政府就解除了中文教育禁令。21 世纪初就正式确立了中文的第二位外语地位,中文逐步进入泰国国民教育体系。(此处可同时参考吴应辉老师的多篇泰国相关研究文章)因此,相较印尼,泰国华人对于华文的使用频率更高。

表 4 受调查者现有语言能力情况

语言	平均值 M	标准差 SD	语言	平均值 M	标准差 SD
华语	4.40	1.09	客家话	1.66	1.25
英语	3.05	1.24	潮州话	1.56	1.16
印尼语	2.22	1.69	其他	1.43	1.08
马来语	2.16	1.59	福州话	1.13	0.49
泰语	2.11	1.58	海南话	1.10	0.45
粤语	1.89	1.37	闽北话	1.08	0.45
福建话	1.82	1.35			

2. 不同场域下华语使用频率优势

为进一步考察在不同场域下不同语种的使用频率,我们将语言使用场域分为工作、家庭、社交和网络四个场域。其使用频率见表 5。在工作场域,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华语,其次为英语,泰语和印尼语随后;在家庭场域,华语使用频率大幅领先,英语的使用频率虽然领先于泰语、印尼语等,但相差不大;在社交场域,情况与在工作场域类似,华语使用频率第一,英语第二,泰语和印尼语随后,其他语言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由此可以看出,在工作、家庭和社交场域,华语都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而且大幅领先于其他语言;英语虽然仅次于华语的使用频率,且领先于其他语言,但是从数值来看,与华语的用频尚有差距。各国语言中,泰语、印尼语在不同场域的使用频率较高。汉语方言中,福建话、粤语、客家话是不同场域使用频率相对较高的语言。

表 5 各语言在不同场域的使用频率

语言	工作用语		家庭用语		社交用语		网络生活用语	
	用频平均值	标准差	用频平均值	标准差	用频平均值	标准差	用频平均值	标准差
华语	4.17	1.30	3.68	1.66	4.08	1.36	4.24	1.23
英语	2.58	1.29	1.93	1.15	2.54	1.30	2.99	1.41
泰语	1.96	1.63	1.92	1.62	2.01	1.64	1.98	1.59
印尼语	1.95	1.58	1.88	1.56	1.98	1.63	1.92	1.60
福建话	1.39	0.97	1.61	1.24	1.52	1.14	1.28	0.85
客家话	1.35	0.96	1.45	1.10	1.40	1.03	1.19	0.70
粤语	1.44	1.01	1.40	1.00	1.49	1.06	1.36	0.96
潮州话	1.25	0.76	1.38	1.07	1.36	1.00	1.17	0.67
海南话	1.04	0.36	1.04	0.31	1.02	0.21	1.03	0.23
福州话	1.03	0.24	1.03	0.29	1.04	0.29	1.03	0.26
闽北话	1.02	0.14	1.03	0.22	1.03	0.22	1.02	0.18
马来语	1.74	1.34	1.34	0.82	1.58	1.15	1.5	1.04
其他	1.29	0.94	1.36	1.07	1.33	1.00	1.28	0.91

3. 收入水平

从收入水平看,月收入人民币 3000 元以下的占比 22.3%,3000-6000 的占比 41.8%,6000-10000 的占比 22.3%,10000-15000 的占比 9.2%,15000 元以上的占比 4.5%。详情见表 6。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受调查者不同的来源对月收入有影响。收入从高到低的群体依次为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的受调查者。从标准差看,印尼的离散性最高,其次是马来西亚和泰国。这表明,印尼的受访者平均收入较低,且个体差距较大。另外,调查还显示,马来西亚和印尼由于历史和地域等原因,语言相通,贸易合作机会更多,印尼不少华裔选择去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工作。这一方面是因为在马

来西亚、新加坡收入比在印度尼西亚收入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印尼与马来西亚之间语言差别不大,方便生活、工作。

表 6 受调查者月收入分布情况

月收入水平	频率	百分比
1. 3000 元以下	65	22.3
2. 3000-6000 元	122	41.8
3. 6000-10000 元	65	22.3
4. 10000-15000 元	27	9.2
5. 15000 元以上	13	4.5
总计	292	100

四、语言的交际价值与经济分析

语言经济学认为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语言能力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和经济地位。^① 此前,一些语言经济学者已经提出了一些语言经济价值的测算方法,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参考,但与本文的研究重点有所区别。一是在研究视角上,以往主要是从经济学视角,研究语言对国计民生、全球经济的影响,而本文则是从语言学、社会和文化交流互鉴角度,研究语言经济价值对语言使用者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二是在影响因素选取上,瑞士经济学教授 Francois Grin 提出,语言的价值可以从“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来看^②。从经济学视角开展的研究一般着眼于“社会价值”,将“标准、语种、普及度、使用水平,以及语言通过心理作用产生的经济效益”这些宏观因素作为测算项^③;本文则主要从“个人价值”角度,关注语言能力、语言使用等与人相关的因素的作用,着眼的是个人价值汇聚成的社会次生群体行为价值。总之,以往研究多着眼于经济学,本文着眼于语言学;以往研究多测算宏观整体指标,本文测算中微观个体指标。有鉴于这两大不同,我们提出了“语言的交际价值指数”“语言的经济价值指数”两个指数,力求评估语言在工作、家庭、社交和网络中的使用频率,间接衡量了语言能力作为人力资本的价值。

(一) 语言交际价值指数

语言的功用首先在于交际和使用。评价一种语言的价值不应只是考虑在工作和经济场域中的价值,也应该考虑该语言在工作、家庭、社交、网络四个场域的频度。我们调查了 13 种语言在工作、家庭、社交、网络中的使用频率,取这四者的均值,描写不同语言的交际价值指数。

具体公式为:

$$\text{语言交际价值指数} = (\text{该语工作用频} + \text{家庭用频} + \text{社交用频} + \text{网络用频}) \div 4$$

取值范围为 1-5, 1 为最低, 5 为最高。

综合来看(详见表 7), 华语的交际价值(4.04 分)遥遥领先于包括英语在内的其他语言。这也反映了华语作为华侨华人共同语的强大价值,属于第一梯队的高交际价值语言。在工作、家庭、社交和网络四个场域的使用频度都是最高的。英语(2.51)属于第二梯队的次高交际价值语言。主要是在家庭场域中使用高频度较低。第三梯队的中等交际价值语言可以有泰语(1.97 分)、印尼语(1.93 分)和马来

① 张卫国:《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经济研究》2008 年第 2 期。

② François Gr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Economics,”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vol. 4, no. 1, 2003, pp. 1-66.

③ 刘悦:《语言的经济价值测算及其实证研究》,《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 年第 5 期。

语(1.54分)。马来语在家庭场域用频显著较低,这说明马来西亚华裔比其他国家的华裔更少使用国家通用语。第四梯队属于较低交际价值的语言,也就是各类汉语方言。其中最具有交际价值的是福建话、粤语、客家话和潮州话。可以归纳为次低价值语言。他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工作和家庭场域中,在社交和网络环境下的优势并不明显。

尽管汉语方言在大多数场合下并非高频使用,但在工作和家庭环境中,其使用频率则相对较高。其在社交,尤其是网络生活中的使用频率相当低。而价值较高的语言,无论是工作、家庭还是社交生活,均有较不错的表现。这表明,从社交生活场域退缩,成为汉语方言应用明显不足的原因。一种语言的交际价值衰退,最先从社交场域开始,工作场域最为关键,而家庭场域是最后的堡垒。反观,一种该语言如果在社交、网络中拥有用武之地,那么该语言的保持、生存、发展,也就有了相当的基础了。

表7 不同语言交际价值指数表

语言	工作用频	家庭用频	社交用频	网络用频	平均 (交际价值指数)	等级
华语	4.17	3.68	4.08	4.24	4.04	高价值
英语	2.58	1.93	2.54	2.99	2.51	次高价值
泰语	1.96	1.92	2.01	1.98	1.97	中等价值
印尼语	1.95	1.88	1.98	1.92	1.93	
马来语	1.74	1.34	1.58	1.50	1.54	
福建话	1.39	1.61	1.52	1.28	1.45	次低价值
粤语	1.44	1.40	1.49	1.36	1.42	
客家话	1.35	1.45	1.40	1.19	1.35	
潮州话	1.25	1.38	1.36	1.17	1.29	
海南话	1.04	1.04	1.02	1.03	1.03	较低价值
福州话	1.03	1.03	1.04	1.03	1.03	
闽北话	1.02	1.03	1.03	1.02	1.03	

(二) 语言的经济价值指数

语言能力可以被视为一种人力资本,它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贡献。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信息成为重要的资源和财富,具有较高语言运用技巧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在归纳计算不同语言的交际价值指数的基础上,经济仍然是本研究最为关心的视角,也是最终决定一种语言大小的方面。

相关研究表明,语言能力越强,意味着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对应的收入回报(如工资、职业机会)也越高^①,英语能力的提升对移民收入的增加具有线性相关性^②,且不同能力等级对应不同收入溢价^③。这些研究为语言经济价值的测算提供了理论前提,我们进一步提出,不同语言经济价值指数的计算方法。具体公式为:

语言经济价值指数=受调查者[(该语能力×月收入等级)÷5^④]的平均数

根据这一公式测算(详见表8),华语仍然遥遥领先(2.07),为第一梯队,这也验证了华语在东南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英语紧随其后(1.51),是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包括五种语言,三种当地国语——马

① 张卫国:《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

② 程虹、刘星滢:《英语人力资本与员工工资——来自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③ Hoyt Bleakley and Aimee Chin, “Language Skills and Earnings: Evidence from Childhood Immigran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6, no. 2, 2004, pp. 481-496.

④ 为使“语言经济价值指数”统一为5度衡量,1为最低,5为最高。将“该语能力×月收入等级”的得数除以5。如华人某语言的能力数为4,掌握该语后的月收入等级为3,相乘为12。为使其回归为5度衡量,需除以5,以便对比。

来语(1.05)、印尼语(1.03)和泰语(0.99)——验证了华语在东南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两种强势方言粤语(0.95)及福建话(0.91);客家话、潮州话属于第四梯队,也可以称之为次低价值语言。这几种方言都是前文提到的“连接起了港澳台和东南亚的立交桥东南方言区方言”^①,说明在特定言语社区,这些方言的经济价值不容小觑。剩下的属于较低经济价值语言。这个公式的合理性在于它尝试将语言能力与经济收入之间的关系量化,并通过除以5来标准化指数,使其在1到5的范围内,便于比较不同语言的经济价值。这种量化方法在经济学中是常见的,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语言能力对经济收入的潜在影响,并为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提供依据。

在此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所得数值本质上是“就业广度”与“收入深度”的区别。我们都知道英语相当于一个“门槛”(Necessary Condition),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其通用性和实用性,所以大家都觉得有用,且基本已经掌握。而华语相当于一个“杠杆”(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High Wage),只有在特定圈层,如中资企业、贸易行业等才能带来高额溢价,所以算出来的指数高。二是虽然某一语言能力与月收入之间并非在任何工作场景下都存在严格线性对应关系,但是多位访谈者均表示,二者存在较强相关性。郭先生指出“企业用工都喜欢优先录用具有多语能力者,即使有的语言,如福建话目前可能工作不上,但企业愿意为未来的市场拓展支付人力资本。”^②这表明,某一语言的能力与其工作机会获得、月收入存在相关性。也即,某一语言能力,是其多语能力的组成部分。这与张卫国研究发现的“双语者在那些不需要语言技能的工作岗位上也具有优势”^③的结论一致。

表8 东南亚华人语言经济价值分层

语言	经济价值指数	等级 ^④
华语	2.07	高价值
英语	1.51	次高价值
马来语	1.05	中等价值
印尼语	1.03	
泰语	0.99	
粤语	0.95	
福建话	0.91	
客家话	0.77	次低价值
潮州话	0.75	
福州话	0.53	较低价值
海南话	0.52	
闽北话	0.51	

(三) 语言交际价值和经济价值对比分析

将语言的交际价值和经济价值进行对比分析(见图1),会有如下发现:

第一,华语的交际价值和经济价值都是第一,但是二者差距很大(将近2分)而其他语言在两者上的分差大约只在0.5-1分之间。交际价值高反映了该语言具有较为深厚的社会基础,经济价值高反映的是该语言较高的经济应用场景。二者差别越大,表明该语言经济价值提升空间越大。华语在受调查者当中具有坚实深厚的社会基础,但是经济价值却并未具有相同的地位,这表明,华语在未来的经济价

① 李宇明:《推广普通话与扶贫事业》,中国语言扶贫与人类减贫事业论坛上的发言,2019年10月15日。

② 访谈于2024年12月20日兄妹俩作为校友代表回学校时进行。

③ 张卫国:《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

④ 等级划分的考量是,按照指数跨度和聚集程度,切分为不同等级。如2.07和1.51跨度较大;0.51、0.52、0.53相对集中,可以划分为不同等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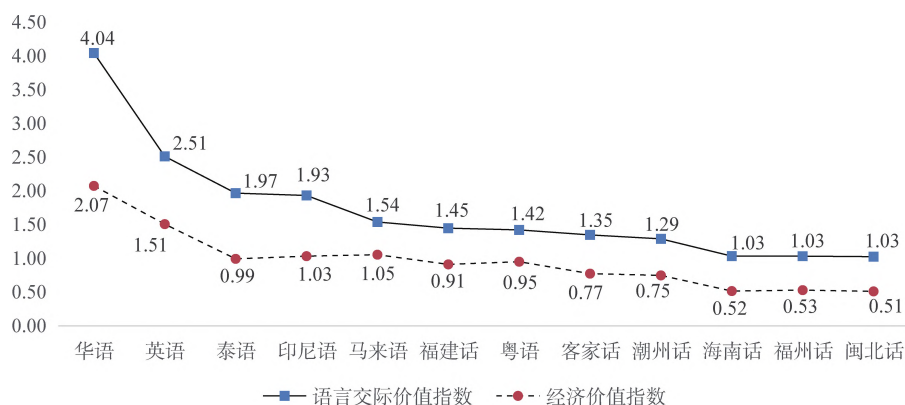


图1 语言交际价值和经济价值对比折线图

值增长空间广阔。相应地,英语、泰语、马来语这些差值在1左右的语言未来经济价值增长空间较为广阔,而马来语和其他汉语方言,这些差值在0.5左右的语言经济价值增长空间相对较低。

第二,英语的交际价值与经济价值均不是第一,而是落后于华语。这与我们此前的一般认识不相符。此前一般认为,当前最具有经济价值的语言仍然是英语。但是至少在本调查中,我们看到,在东南亚有一部分华裔,对华语很有信心。华语的交际价值和经济价值可能已经超过了英语。这种现象令人振奋,同时也给我们更多启发和思考——与华语价值地位相适应的语言政策、语言产品是否已经就位?

第三,各语言的交际价值均高于经济价值指数。从图1来看,各语言的交际价值均高于经济价值,尤其是华语、英语、印尼语和泰语的交际价值高出经济价值较多。这表明,这四种语言在经济、社会交往等各个场域都具有较强的使用价值。除了工作场域外,各语言都在家庭、社交、网络等场域仍有一定的用武之地,虽然这种应用空间对华语、英语以外的几种语言,特别是方言而言并不算太大。

第四,各汉语方言的经济价值指数与交际价值指数比较相似。这表明,方言在受调查者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高,提升空间有限。除了福建话、粤语、客家话等语言还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外,其他语言在经济工作场域的价值提升空间已经不多了,在家庭、社交、网络等场域的使用频度不高的情况下,未来方言的发展存续问题将进一步凸显。

第五,结合表7和图1来看,一种语言的交际价值衰退,最先从社交场域开始,工作场域最为关键,而家庭场域是最后的堡垒。反观,一种该语言如果在社交、网络中拥有用武之地,那么该语言的保持、生存、发展,也就有了相当的基础了。

五、语言与工作、收入和行业的关系分析

前文,我们分析了语言的价值,接下来结合受调查者的主观认识,分析语言与工作机会、收入提升和行业的关系。

(一) 语言与工作机会和收入提升的关系

1. 受访者的主观认识

整体而言,受调查者对掌握该语言后能增加收入的判断弱于有利于就业和工作的判断,除海南话、福建话、潮州话三语外的各种语言均被认为更有利于就业和工作,但是增加收入略低。差值在0.1到0.29之间。这表明,对于大部分语言而言,受调查者认为掌握一门语言会有助于就业,但是增加收入有所滞后。受调查者对语言带来的经济效益信心相对不足。

具体从增加收入情况(详见表9)来看,受调查者认为,最能增加收入的语言能力依次是,掌握多种语言能力($M=3.85$)、英语($M=3.78$)、华语($M=3.41$),这可以被视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的语言有印

尼语(M=2.35)、泰语(M=2.62)、马来语(M=2.45),方言中的粤语(M=2.14)和福建话(M=2.08)也基本能排入。其他的汉语方言均值在2以下,算作第三梯队。

从有利于就业工作(详见表9)来看,受调查者认为最能有利于就业工作的语言是英语(M=3.92),其次是多语能力(M=3.92)和华语(M=3.7),算第一梯队。第二梯队仍然是当地主流语言印尼语(M=2.51)、泰语(M=2.7)、马来语(M=2.46)和汉语方言粤语(M=2.2)、福建话(M=2.11)。第三梯队为汉语方言,都在2分以下。

表9 受调查者认为不同语言能增加收入和有利于工作就业情况表

语言	认为掌握该语会增加收入		认为掌握该语会利于工作就业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多种语言	3.85	1.23	3.92	1.26
英语	3.78	1.24	3.99	1.17
华语	3.41	1.58	3.70	1.58
印尼语	2.35	1.33	2.51	1.44
泰语	2.62	1.43	2.72	1.54
马来语	2.45	1.32	2.46	1.41
粤语	2.20	1.25	2.14	1.26
福州话	1.91	1.08	1.87	1.08
客家话	1.95	1.12	1.97	1.11
海南话	1.88	1.08	1.88	1.09
福建话	2.08	1.23	2.11	1.24
闽北话	1.86	1.08	1.85	1.09
潮州话	1.98	1.16	1.99	1.16
其他	1.89	1.23	1.82	1.17

从不同语言在增加收入和促进就业方面的感知(图2)来看,受访者对英语和华语的评分较高,认为掌握这两种语言在增加收入和促进就业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其他语言如印尼语、泰语、马来语的评分相对较低,说明其被认为在收入和就业方面的帮助较为有限。在部分语言(如福州话、海南话等)上,两个指标的评分趋于一致,表明受访者对这些语言的收入和就业帮助持相似的看法,但整体上对语言促进就业的认知稍高于对收入增加的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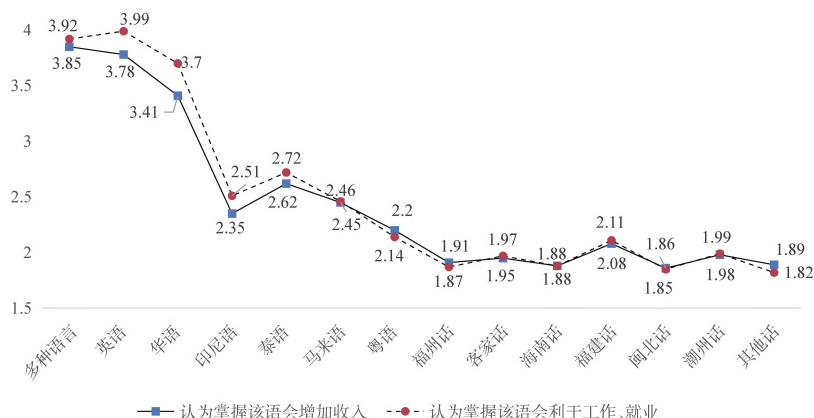


图2 受调查者认为不同语言能增加收入、有利于工作就业的程度

2. 主客错位揭示东南亚语言市场双重结构特征

本研究数据揭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受访者在主观上认为英语对就业的帮助略高于华语,但在

前文基于实际收入计算的客观“经济价值指数”中,华语(2.07)却显著超越英语(1.51)。这种“感知”与“事实”的错位,并非数据误差,而是反映了东南亚当前语言市场的双重结构特征。

第一,英语表现为“通用型人力资本”(General Human Capital),决定了就业的“广度”。在马来西亚、印尼等国,英语长期以来是跨国公司和现代服务业的通用工作语言,是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基本门槛。因此,受访者普遍感知到英语的不可或缺性,给予其极高的主观评分。

第二,华语表现为“专用型人力资本”(Specific Human Capital),决定了收入的“深度”。这里的客观指数计算纳入了“收入等级”作为权重。在本文的样本中(65.75%涉华),掌握华语成为了获取“超额工资溢价”的关键杠杆。随着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规模的扩大,大量中高层管理岗位和技术岗位都明确指定需要“中外多语”人才,这类岗位的薪资往往远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如下文访谈中提到的“工资翻倍”。

由此可以得出,英语是“入场券”,保证了受访者“找得到工作”;而华语则是“加速器”,帮助受访者在特定领域拿到高薪。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加权计算经济价值时,华语凭借高收入群体的拉动,客观指数反超了英语。同时提示我们,华语的经济价值具有鲜明的“圈层溢价”特征,必须置于“涉华商贸网络”这一前提下进行理解。

图2反映了语言技能在劳动市场中的“人力资本收益”(human capital return),即不同语言对个人收入和就业能力的潜在影响。英语和华语具备显著的经济和就业优势:在所有语言中,受访者认为英语和华语的掌握能够显著增加收入和促进就业。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在国际市场中具备明显的竞争力;华语的高评分则反映了其在华人圈和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而区域性语言的经济回报较低:如福州话、海南话等区域性语言的评分较低,说明受访者认为这些语言在增加收入和就业机会方面的影响力较弱。这可能与这些语言的使用范围有限、局部性强有关。印尼语、泰语、马来语等东南亚语言评分中等偏低:虽然东南亚市场不断发展,但印尼语、泰语、马来语的评分相对较低,说明受访者对掌握这些语言的经济收益预期不高。可能由于这些语言的国际化程度较低,或仅在特定区域具有较强影响力。

由于调查问卷中这一部分属于主观问卷,为了验证这种主观认识是否与事实相符,我们特地进行了深度访谈。从访谈结果来看,是可以与被调查者的主观判断相映证的。

印尼访谈者郭先生指出:“语言因素已经是印尼就业市场极其重要的因素。中文的重要性和就业机会已经超过了英文。从印尼的招聘网站来看,中资企业数量明显超过了其他国家的企业,大约占到就业市场的80%左右。而且工资普遍比较高。印尼的平均工资是2500-3000元人民币/月,但中资企业招聘大多是7000元起步。如果既会中文又会英文,还有技术或经验,工资还会翻倍。”郭女士作为中资公司HR,也证实如果会中文,即使是失业,也会在3、4天之内找到工作。她还给笔者展示了中资企业招聘的各种微信群的照片。谈及中资企业骤增的原因,郭先生指出除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因素外,近年来美国对中国企业加增关税也是中资企业大量赴印尼投资的重要原因。^①通过查询印尼官方资料可知,中国在整个2019年9月至2024年9月期间已经在印度尼西亚投资341.9亿美元或相当于印尼盾534.5万亿(汇率为每美元印尼盾15.634)。目前,中国已成为印度尼西亚第二大投资者^②。官方数据与我们对印尼的访谈相一致。

在我们与泰国受访者的深度访谈中了解到,泰国的平均工资大概每月18000-25000泰铢,如果在中资企业就业,工资差不多是60000泰铢每月。^③根据泰国财政部外国投资合作司发布的权威报告显示截止到2024年12月,新加坡、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分列泰国外商投资的前三位。其中,新加坡的大部分

① 访谈于2024年12月20日兄妹俩作为校友代表回学校时进行。

② <https://money.kompas.com/read/2024/05/16/205318026/kemenperin-investasi-china-di-ri-capai-rp-4517-triliun-dalam-4-tahun-terakhir>

③ 该访谈于2025年1月5日在线上上进行。

投资来自中国和美国公司,他们选择新加坡作为扩大投资的基地,尤其是在数据中心和云服务业务方面。^①由此可见,中国是泰国最大的外商投资来源国。

来自马来西亚的访谈者李先生和林女士也都证实了自“一带一路”以来,更多中资企业愿意到马来西亚投资。华语的价值也就随之增长。李先生还说,非华裔马来西亚人对华语越来越重视,反倒是华裔家庭的子女对英文重视更多。李先生表示“这也是东南亚华人多语意识的一种体现,马来西亚华裔家庭的孩子华语环境相对较好,所以会更注重英语的学习。”^②这与我们查找到的权威信息显示基本一致。新闻显示: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长扎夫尔表示,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商界一直站在双边关系的前沿,中马贸易合作促进两国经济增长,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扎夫尔指出,过去50年间,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促进了基础设施改善和制造业增长,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推动了马来西亚经济发展。^③

访谈资料的深度挖掘进一步修正了量化数据的结论。虽然在问卷的通用指数中,福建话、粤语等方言的经济价值较低,但在访谈中,多位从事传统贸易的受访者强调了方言的隐性价值。在东南亚的传统华人商业网络中,经济行为往往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方言(如闽南语系、广府话)在这一行业中不仅仅是信息传递的载体,更是一种“信任凭证”和“社会资本”。例如,来自泰国的郑先生(家族企业主)在访谈中指出:“在五金建材的批发网络里,如果你能说流利的潮州话,供应商会默认你是‘自己人’,赊销额度和付款周期都会比说英语或泰语的人更宽松。”^④这表明,方言通过构建“族群认同”,有效降低了商业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成本。因此,方言的经济价值呈现出“隐性”和“行业特定性”:它在现代标准化的企业制度(如外企、金融)中价值式微,但在依靠信用和人脉的传统商贸流通领域,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润滑剂作用。这也提醒我们,语言的经济价值评估不能仅看显性的工资单,还应考虑其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贡献。

(二) 语言在不同行业中价值的认识

我们请调查对象选出在不同行业中更有价值的语言,这是多选题。被选择的有价值行业越多,该语言的得分就越高。详情如图3和表10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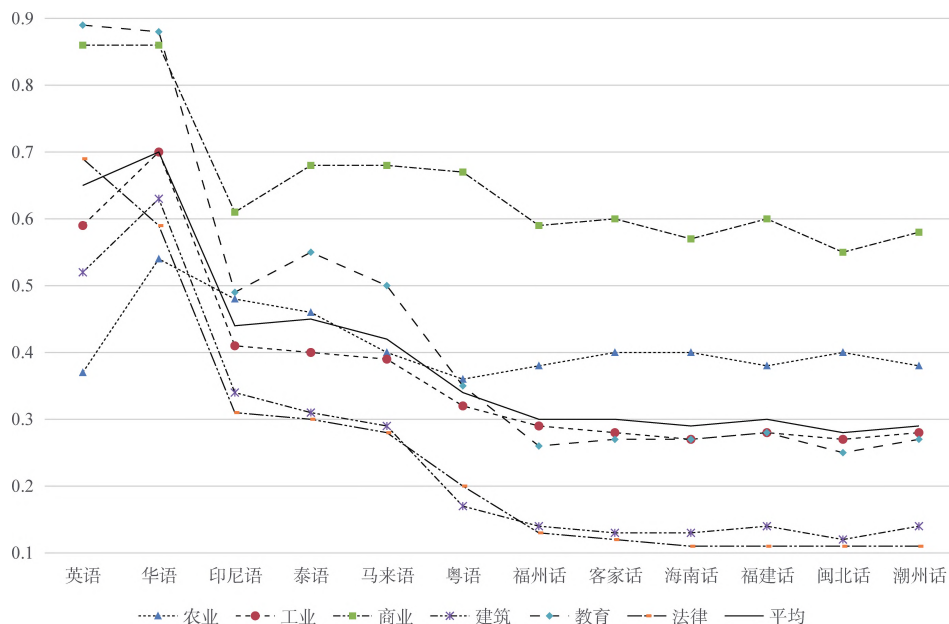


图3 被调查者对不同行业中各语言用处的判断图

- ① 资料来源泰国财政部官方网站提供的外国投资报告《外国直接投资统计2024年(1-12月)月度累计》
 ② 该访谈于2024年12月28日在线上进行。
 ③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Bernama)2024年7月15日报道。
 ④ 该访谈于2025年1月5日在线上进行。

表 10 被调查者认为各语言在不同行业中的用处

语言	农业	工业	商业	建筑	教育	法律	平均值(M)
英语	0.37	0.59	0.86	0.52	0.89	0.69	0.65
华语	0.54	0.70	0.86	0.63	0.88	0.59	0.70
印尼语	0.48	0.41	0.61	0.34	0.49	0.31	0.44
泰语	0.46	0.40	0.68	0.31	0.55	0.30	0.45
马来语	0.40	0.39	0.68	0.29	0.50	0.28	0.42
粤语	0.36	0.32	0.67	0.17	0.35	0.20	0.34
福州话	0.38	0.29	0.59	0.14	0.26	0.13	0.30
客家话	0.40	0.28	0.60	0.13	0.27	0.12	0.30
海南话	0.40	0.27	0.57	0.13	0.27	0.11	0.29
福建话	0.38	0.28	0.60	0.14	0.28	0.11	0.30
闽北话	0.40	0.27	0.55	0.12	0.25	0.11	0.28
潮州话	0.38	0.28	0.58	0.14	0.27	0.11	0.29
其他	0.47	0.24	0.47	0.13	0.24	0.14	0.28

1. 华语与英语在商业和教育行业优势明显

从平均值来看,华语(M=0.7)的总均值高于英语(M=0.65),其次是当地主流语言(M 印尼语、泰语、马来语=0.44、0.45、0.42),而汉语方言的价值最低,基本在0.3分以下。

从不同行业来看。在农业中,华语和当地主流语言占有较多优势;在工业中,华语优势明显,英语紧随其后,再次是当地语言;在商业中,华语和英语并驾齐驱,当地主流语言是第二梯队;在建筑业中,华语和英语也有优势,但是优势并不如商业明显;在教育行业,华语和英语也是齐头并进,遥遥领先;在法律行业,英语高于华语,二者仍是第一梯队。

总体而言,华语和英语是工作中最有竞争力的两种语言,二者竞争明显。在农业、工业中,华语占优势,在教育和商业行业二者并列,在建筑和法律行业中英语占优势。当地主流语言主要在农业中占优势,在其他行业优势一般,而汉语方言在商业中具有与主流语言持平的竞争力外,在其他行业中的价值均较少。

2. 商业是体现语言经济价值最明显的行业

从不同行业看,商业是语言经济价值体现最为明显的行业,是语言经济价值的第一区域。英语、华语和当地主流语言在教育行业中能排第二,但是汉语方言在教育行业的经济价值较低。英语、华语和当地主流语言在农业的行业优势并不明显,而汉语方言在农业行业的经济价值虽然并未超过前三者,但是作用比较稳定,没有明显下滑。在工业行业,各语言的经济价值均处于中间水平。在法律和建筑行业,华语和英语明显较高,当地主流语言明显落于第二梯队,而汉语方言的经济价值很低。

从每一种语言的横向比较分析来看,调查者认为英语在商业和教育行业的作用最大,对农业的作用最小。华语与英语相似,在商业和教育作用最大,在农业和法律的作用较小。印尼语、马来语和泰语比较相似,都在商业作用最大,在法律行业作用最小。对不同汉语方言作用的调查,或可反映出不同方言背景的华人的职业分布。如粤语在商业作用最大,在建筑行业作用最小,这说明粤语背景受调查者从事建筑的最少。而福州话和客家话也是商业作用最大,在建筑和法律作用最小。说明这两种语言背景的华人也是做生意的最多,而从事建筑和法律行业的最少。而下面的几种汉语方言的情况也是极为相似的,均为在商业行业作用最高,建筑和法律行业的作用最少。从历史上看,东南亚华人多以从商起家,而华人又一向有捐资助学的优良传统。东南亚华文教育大多是靠当地华人捐款办学的,这样的模式一直沿用至今。而法律从业者较少,我们分析是由于从事法律行业需要比较系统且专业的培训,与方言的关系确实不大。

六、结语

本研究揭示的趋势具有重要的前瞻性意义:证明了在“一带一路”经贸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华语已经从一种单纯的族群文化符号,成功转型为具有高市场回报率的“关键经济资源”。华语正逐渐成为东南亚华人最具竞争力的语言能力,在交际功能、经济回报、行业应用等维度的显著领先特征,同时也说明,东南亚对华语能力的市场需求在一段时间内仍具有较大的空间,相较而言,英语的市场需求则相对饱和,很难产生像华语这样的溢价效应。作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和具有全球通用语潜力的语言,中文应该承担起为全球中文语言生活共同体提供更好服务的责任,为这个共同体的脱贫减贫贡献更多心力。^①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语言是一种制度。^②充分认识语言的经济属性,有利于国家制定更有效的语言规划,也有利于东南亚国家充分挖掘其自身资源,通过语言教育普及(如加强华语培训)、产业合作(如多语服务外包)提升华语经济地位。

通过本研究,我们在个体、政策制定者、华语社区和如何推动语言产业化良性发展的角度获得诸多启示。对个体来说,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掌握华语、英语等多语言能力可显著提升就业竞争力与收入水平。个体应优先投资于高经济价值的语言学习,如华语和英语,也要注重多语能力的协同发展。同时,方言的价值不可忽视,在商业和社区服务中,粤语、福建话等汉语方言仍具有实用性,尤其在华人密集的东南亚市场,掌握方言可增强社会网络与商业机会。对东南亚国家政策制定者来说,应重视华语的价值,支持本国华文教育发展,以满足本国企业与中资企业之间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语言需求;对华语社区来说应尽量保护好汉语方言资源,通过社区活动、文化项目保留方言使用场景,避免其在传统商贸网络中的隐性经济价值进一步衰退。

如何推动语言产业化发展,从本研究也可以得到启示。发展如翻译、跨境电商等多语服务产业,将语言能力转化为经济红利。制定激励政策,鼓励企业优先雇佣多语人才,尤其是掌握华语和英语的劳动力。中资企业要加强区域合作就需采取本地化人才战略。在东南亚投资时,应重视招聘具备华语能力和本地语言的员工,以降低沟通成本、增强市场渗透力。同时中资企业一定要尊重文化多样性,避免单一文化输出,需结合当地语言习惯调整商业模式,提升企业社会接受度。

需要说明的是,结论的推广需充分考虑样本结构的局限性。首先,样本的“涉华偏向性”对结论有显著影响。调查显示,65.75%的受访者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且教育、贸易行业占比偏高。这实际上构建了一个“高华语依赖度”的抽样框。因此,本文测算出的华语极高经济价值指数(2.07),主要反映的是“深度参与中外经贸合作的华人精英群体”的语言收益,而非东南亚全体华裔劳动者的平均状况。对于完全本地化或仅服务于欧美市场的华人而言,华语的溢价效应可能会有所减弱。其次,受限于问卷发放渠道(主要通过校友网络和商会),样本中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略高于当地平均水平。未来的研究若能拓展至蓝领阶层或服务层基层样本,将能更全面地描绘多语能力的经济全景。

未来,应重视华人多语能力的价值,使其充分助力中外经济合作和文明交流互鉴。东南亚华人及新生代重视多语能力的持续提升,将其视为个人职业发展的核心技能。我们也呼吁东南亚各国政府与中国合作,将语言规划纳入“一带一路”框架,通过政策支持、教育资源倾斜和产业合作,释放华语及汉语方言的经济潜力。国内相关部门通过政策支持、教育推广和文化交流帮助提升华语及汉语方言在东南亚的经济地位,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其在更广泛的经济行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语言能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本,其价值日益凸显。本文为理解语言能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证依据。期待未来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深化,为推动语言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责任编辑:琬洛)

① 王春辉:《中国语言扶贫的意义》,《语言战略研究》2020年第6期。

② 张卫国:《语言的经济分析:一个基本框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页。